

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与监督水平对研发强度的影响 ——以政治关联为调节变量

李荣 马金鹏 张玉明^①

【摘要】 近年来，对中小企业研发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但却鲜有人将小微企业这一概念从中小企业中分离出来，并对其研发问题进行单独研究。为丰富关于小微企业研发问题的知识和认识，本文利用“我国小微企业动态发展数据库建设研究”调研活动所得数据，对我国小微企业内部治理特点（两权合一程度、监督水平）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引入政治关联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和监督水平与其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第二，我国小微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负向调节上述关系。该结论为小微企业创新问题提供了以下参考，第一，小微企业并无必要盲目引进现代经理人制度；第二，小微企业应及早做好监督制度建设工作；第三，小微企业不应过分依靠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现时好处。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根据欧新黔（2006）的统计，截止到当年，我国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技术创新数量以及新产品开发数量已分别占到了全国总数的65%、75%和80%。

然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定义，根据所处行业的不同，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上限可达1亿至8亿元，雇员上限则可达300至2000人，这使得中小企业（即中型及中型以下企业，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在规模上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往的文献并没有将中、小、微企业进行区分并加以研究。根据本研究的统计，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以及“小微企业”与“技术创新”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前者得到2631条结果，后者则只有28条。这充分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中小企业内部的规模异质性特点认识还不充分。进一步的，以样本观之，以往文献或采用二手数据法，或采用问卷法收集样本，前者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沪、深两市的中小板、创业板企业，具有样本企业普遍体量较大的特点，陈晓红等（2008、2009）的研究皆属此例；后者则主要以较小的地理范围中的企业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其代表为郭研等（2011）对中关村中小企业的研究和黄鲁成等（2014）对北京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研究。可以看到，两种研究设计各有优势与不足之处：前者能够兼顾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企业的差异，却难以兼顾企业体量的差异；后者能够兼顾不同规模的企业，却难以跨越单一地理范围的局限。因此，本研究认为，已有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中型企业代表中、小、微企业，以发达地区中小企业代表全国中小企业这两大问题。

另外，纵看国内学者在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前人的研究多将技术创新作为解释变量，即他们更倾向于研究技术创新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使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以被引用量前20名的文献为例，陈晓红等（2008、

^① [作者简介] 李荣，女，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金鹏，女，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玉明，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2009)、姚世斌(2010)等人不约而同的关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而在为数不多的将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文献中,又多倾向于将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依前法检索,杜占元等(1998)、张毅华等(2000)、杨爱杰(2004)等人又不约而同的讨论了政府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影响。总之,基于对国内经典文献的统计结果,本研究认为我国学者对于由企业内部因素(特别是治理因素)引致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

综合以上两点对以往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将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小型与微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讨论其内部治理特征(主要是两权合一程度与监督水平特点)以及政治关联水平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强度)的影响。

二、理论与假设

(一) 小微企业定义与特点

在进行理论演绎之前,本研究认为需对小微企业的定义进行说明,并藉此引申出其相对于大型或中型企业的异质性。

1. 小微企业的定义。根据工信部的定义,不同行业中小微企业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小微企业进行刻画:其一为营业收入,其二为员工数量。

在营业收入方面,以年计,农林牧渔业/零售业 500 万元以下的、信息传输业/房地产业/物业管理业 1000 万以下的、工业 2000 万以下的、交通运输业 3000 万以下的、批发业 5000 万以下的、建筑业 6000 万以下的,为小微企业。

在员工数量方面,批发业 20 人以下的、零售业 50 人以下的、信息传输业/租赁与商务业/其他产业 100 人以下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物业管理业 300 人以下的,为小微企业。

2. 小微企业的特点。根据上述定义与我国小微企业实际情况,本研究认为我国小微企业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小而有量。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在体量上明显偏小,但由于其仍有规模,因此其研发创新的意愿与能力仍不可忽视。第二,产业集中。根据本研究的统计,在小微企业中,工业企业、餐饮企业无论在企业数量、雇员数量以及销售收入上都在全部样本的前列,这两种企业对于创新的要求也较高(前者侧重专利等技术、后者侧重配方等专有技术),这使得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二) 两权合一程度与研发强度

研发能力和研发意愿是企业研发强度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小微企业中,其研发意愿又与企业两权合一(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统一)的程度密切相关,其理论依据如下:

1. 资源基础观理论。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具有某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力,企业必须保护这些资源以维持生存,并合理的利用它们,以实现发展。而这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尤为关键(Terzioviski M, 2010)。从技术创新的类型上看,中国小微企业主要以改进创新和模仿创新为主(文罡, 1999),这意味着企业在研发的过程中必须要先行投资一定数量的已有的创新成果。因而,小微企业在进行研发决策时,就会面临或然性的研发成功带来的好处与或然性的自有技术泄露导致的特殊资源损失之间的权衡。为尽量减少后者所致之损失,小微企业所有人会尽量保证关键管理职位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因此,两权合一就成为了中国小微企业保护特殊技术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2. 代理理论。代理理论认为, 基于经济人假设, 委托-代理双方在效用函数、风险倾向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导致委托-代理双方产生冲突, 形成了代理成本。例如, 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 代理人被认为是风险厌恶且具短期倾向的, 其对具有风险承担、长期指向的研发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够热心的。显然, 在上述逻辑下, 两权分离程度越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监督、激励成本也就越大, 而两权合一则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一问题。Qiang Liang 等 (2012)、Suk Bong Choi 等 (2012) 以家族企业为样本所做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逻辑。

3. 高阶理论。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个人特征与企业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 创始人——较之继承者——被认为对企业绩效有着更加正面的影响。例如, Daily 等 (1992) 认为, 对于小企业而言, 创始人直接管理企业比聘用职业经理人更利于提高财务绩效; 贺小刚等 (2011、2013) 也认为创始人离任会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本研究中, 由于 85% 以上的样本企业存在时间都短于 10 年, 其创始人掌舵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高, 这为两权合一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胜任力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一。

假设一: 小微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结合程度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监督水平与研发强度

然而, 为了进一步的发展, 小微企业可能会放弃两权合一的治理结构而引进外部方参与企业研发活动。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 小微企业囿于其规模的限制, 不太可能雇佣一整个研发团队, 因而无力独立进行一整套的研发活动。此时,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 企业会倾向于任用具有高社会资本的职业经理人, 以图利用其社会资本, 与其他企业产生协同效应。Nambisan S (2011) 等的研究就证明了职业经理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的积极作用。其次, 根据胜任力理论, 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 掌握企业所有权的家族不一定能够推举出与企业现阶段情况相匹配的家族经营者, 特别是研发主管者 (Qiang Liang 等, 2012)。此时, 家族会面临一种权衡, 权衡的一方是任用职业经理人所致的企业控制权的或然减弱进而导致的或有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 而另一方则是任用不称职家族成员导致或然性的企业经营不善进而导致社会情感财富的必然损失。这种权衡的结果, 有可能使企业做出任用外部职业经理人的决定。

代理理论认为, 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而代理人则是风险厌恶的。同时, 代理人是寻租的, 存在着“损企利己”的倾向。在研发活动中, 这种倾向可能体现为代理人因为其经济收入与短期绩效息息相关, 而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投在可以立即见效的活动中去, 此消彼长, 企业的研发活动就会面临投资不足的局面。

同时, 根据该理论的解释, 有效地监督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代理成本。例如, 代理理论的泰斗 Eisenhardt (1989) 就曾指出: “当委托人拥有关于代理人行为的足够信息, 代理人就更可能与委托人保持一致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二。

假设二: 小微企业内部监督水平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四) 小微企业政治关联水平的调节作用

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 一直有着正反两个逻辑链。

支持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正面影响的学者们认为, 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使得

企业在融资便利性、政策支持与保护程度、资源获取难以程度等方面获得优势，进而有动机加大研发强度，其具体逻辑如下：1. 从融资便利性的角度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获得银行的支持，进而获得更多、更长期、更低息的贷款（余明桂等，2008）；2. 从政策支持程度的角度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使企业得到税收减免等优惠（Bloom 等，2002），这一点在税项较多的地区尤为明显（吴文锋等，2009）；3. 从政策保护程度的角度看，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研发成果的产权保护更容易得到深度落实，从而消除企业的研发顾虑（Zhou 等，2013）；4. 从资源获取难易程度的角度看，与政府拥有良好关系的企业更可能被介绍与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建立合作，从而获取更经济的技术支持。上述逻辑所致的企业优势，都可以被视为企业的特殊资源，从而增加企业单位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进而增强企业追加投资的动机。

然而，另一派学者也有着严密的逻辑以支持相反的观点，其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1. 企业通过政策支持获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某些特定行业进入壁垒的降低上，一些企业得以有机会投资另一些企业无法涉及的、可以短期获利的“短、平、快”行业（罗明新等，2013），这使得企业从事风险承担性的、长期性的研发活动的动机降低；2.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关联导致企业更容易获取政府以鼓励创新为目的而发放的津贴，但由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与研发基础并无直接关系，导致一些企业虽得到津贴却仍然没有能力有效开展研发活动，致使津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逯东等，2012）；3. 获得政治关联优势本身也需要企业付出许多成本，这就使得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政策、融资等方面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变得“得不偿失”。

综合上述逻辑，再结合我国小微企业的特点，本文做出以下分析：小微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竞争优势相对而言也是单一且单薄的。对那些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可能是其得以存在的唯一竞争优势。因此，即使这些企业能够获得创新所需的资金支持与产权保护，但较之较大型的企业，由于它们的优势并不在于研发能力，其由研发活动获利的可能性仍要低于前者，导致其加大研发强度的动机减少。同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它们也就更倾向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政治关联的比较优势，更加热衷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投资“一本万利”的“短、平、快”项目，其进行研发活动的能力也就相对下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三和假设四。

假设三：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对其研发强度的影响，受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负向调节。

假设四：小微企业内部监督水平对其研发强度的影响，受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负向调节。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2013 年夏，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课题《我国小微企业动态发展数据库建设研究》的资助下，本研究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集中调研活动。以各地小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调查对象，本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涉及全国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 个行业的 936 家小微企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剔除不符合本次研究要求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744 份。本研究所涉及样本的地区、行业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样本的地区分布

省份	数量	百分比 (%)	省份	数量	百分比 (%)
广东	148	19.88%	甘肃	23	3.03%
天津	118	15.85%	湖南	14	1.87%
云南	99	13.26%	贵州	10	1.30%
山西	72	9.65%	内蒙古	6	0.81%
山东	56	7.49%	重庆	4	0.58%
四川	50	6.77%	福建	2	0.29%
浙江	37	5.04%	北京	2	0.29%
新疆	35	4.76%	海南	2	0.21%
江苏	34	4.61%	辽宁	1	0.14%
河北	30	4.03%	湖北	1	0.14%

表 2 样本的行业分布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
农林牧副渔业	24	3.16%	餐饮业	53	7.18%
工业	160	21.55%	信息传输业	13	1.72%
建筑业	22	3.0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3.74%
批发业	68	9.2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5	2.01%
零售业	166	22.27%	物业管理	9	1.15%
交通运输业	11	1.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	2.16%
仓储业	3	0.43%	其他	151	20.25%
住宿业	5	0.72%			

(二) 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研发强度

根据国内外通行的做法,研发强度(R&D Intensity)的衡量方法主要有研发投入/总资产、研发投入/企业市值、研发投入/当期销售收入三种,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我国的小微企业,由于小微企业对总资产和市值的估计不甚准确,前两种方法显然难以使用。故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当期销售收入指标,以Likert五点量表为手段(下同),对研发强度进行衡量。

2. 解释变量——两权合一程度、监督水平、政治关联水平

本研究使用“老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这一问题对所有权与管理权统一的程度(两权合一程度, Connec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COC)进行衡量。在Likert五点量表中,1为“都管”,5为“很少管”,2—4为过渡选项,我们将该问题数值倒置以与其他问题匹配。

本研究使用“制衡机制的有效性”、“控制制度的完善性”、“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这三个问题的平均值对企业监督水平(Monitoring)进行衡量。在Likert五点量表中,1为“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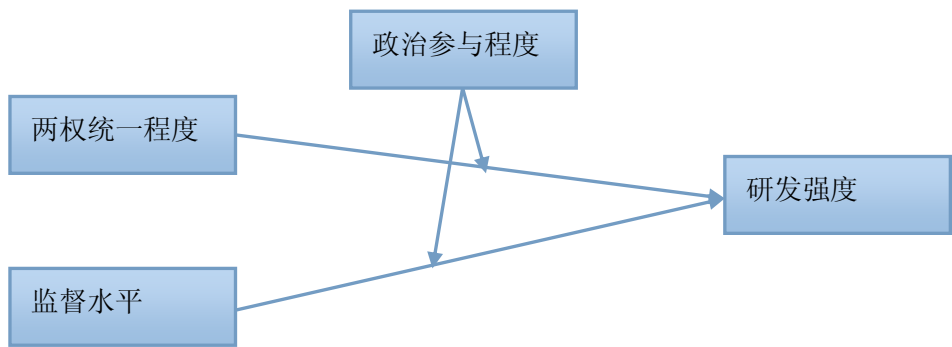
差/很不完善/很差”，5 为“很好/很完善/很好”2—4 为过渡选项。

本研究使用“与政府关系紧密程度”对企业政治关联水平（Political Connection）进行衡量。在 Likert 五点量表中，1 为“很疏远”，5 为“很密切”，2—4 为过渡选项。

3. 控制变量

根据前人经验，本文选取“企业员工数 (Number of Employee)”、“产业类型 (Industry)”、“资产规模 (Asset)”、“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Owner’ s Education)”四个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好地反应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明显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问卷进行了剔除，并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报告如下：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R&D Intensity	744	2.13	2.00	1.18
COC	744	4.25	4.00	0.90
Monitoring	744	3.17	3.00	0.60
Political Connection	744	2.79	1.48	1.26
Number of Employee	744	1.96	3.00	1.12
Industry	744	——	——	——
Asset	744	1.93	3.59	1.41
Owner’ s Education	744	3.59	3.00	0.83

从上表所示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1. 在以 Likert 五点量表计量的以上变量中，企业员工数、资产规模两变量均值明显小于 3，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小”的特点；2. 两权合一程度在均值与中位数两个指标上都很高，体现了小微企业在经营上以创始人直接经营为主的特点，印证了前面的假设；3. 所有者教育程度已经相对较高，说明当代创业者较之老一代已经在知识水平上有了很大进步，但这种知识上的进步并没有使得企业研发强度有与之相匹配

的提升, 这个问题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研发决策, 而本文验证的两个因素正在其列。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在验证上文所述主效应之前,本研究首先计算了各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4。可以看到,1.R&D Intensity 与 COC、Monitoring 间在 95%水平上正相关,为假设一、假设二的逻辑提供了初步的支持;2.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 (最高为 0.309),表明本研究各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问题。

表 4 Pearson 相关系数

X1	X2	M	Z1	Z2	Z3	Z3
1						
0.192**	1					
-0.271**	-0.219**	1				
0.309**	0.238**	-0.271**	1			
0.141**	-0.111**	0.121**	-0.219**	1		
0.305**	0.224**	-0.265**	0.754**	-0.172**	1	
-0.166**	-0.029**	0.161**	-0.122**	0.038**	-0.130**	1

Y1	1	0.297**	0.324**	-0.291**	0.447**	-0.239**	0.465**	-0.047**
变量	Y1	X1	X2	M	Z1	Z2	Z3	Z4

注 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注 2: Y1=R&D Intensity, X1=COC, X2= Monitoring, M=Political Connection, Z1=Number of Employee, Z2=Industry, Z3=Asset, Z4=Owner' s Education。

(三) 多元回归分析

本段使用 SPSS17.0 软件,依次将控制变量(模型一)、解释变量(模型二)、交互项(模型三)代入,进行三步逐层回归,所得结果见表 5。可以看到: 1. 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其两权合一程度越高,其研发强度也相对越高,假设一得证; 2. 小微企业监督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其监督水平越高,其研发强度也相对越高,假设二得证; 3. 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政治关联水平之交互项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其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其两权合一程度对研发强度的正面影响减弱,假设三得证; 4. 小微企业监督水平/政治关联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其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其监督水平对研发强度的正面影响减弱,假设四得证。

表 5 小微企业治理结构与研发强度的关系检验

被解释变量=R&D intensity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控制变量			
Z1	0.182***	0.125***	0.120***
Z2	-0.154***	-0.126***	-0.128***
Z3	0.246***	0.246***	0.202***
Z4	0.018*	0.040**	0.040**
解释变量			
X1		0.139***	0.388***
X2		0.357***	0.698***
M		-0.164***	0.407**
交互项			
X1*M			-0.095**
X2*M			-0.127**

注 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注 2: Y1=R&D Intensity, X1=COC, X2= Monitoring, M=Political Connection, Z1=Number of Employee, Z2=Industry, Z3=Asset, Z4=Owner' s Education。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小微企业内部治理特征显著地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当企业所有者参与经营的程度,即两权合一的程度越高,其创新意愿——体现为研发强度——就越高。其次,当企业决定引进职业经理人或其他外部方参与企业研发活动后,其监督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研发强度,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有了规范、严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后,引进职业经理人才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最后,在我国仍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背景下,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可能越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活动,这可能是企业自恃有了“政治靠山”而认为可以获得更容易盈利的途径,进而放松了企业的研发活动。

结合以上结论,本研究给出如下建议:首先,对于尚不成规模的小微企业,不可不加分辨的盲从“现代企业制度”而忽视了自身的种种特点。在企业规模尚小时,企业所有人亲自经营也许会更有利于创新活动,这对那些以创新为要的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企业尤其有借鉴价值。第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小微企业应该抓住时机,果断建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治理结构(尤其是监督制度),以免在将要引入外部方共同进行创新活动时患得患失、举棋不定。第三,小微企业应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政治关联优势,是我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状态下而带来的特殊、暂时的产物,企业可籍得一时,不可籍得一世,因此,对于那些有志于做大、做强、做长的企业家们,应该未雨绸缪,增强创新意识与研发力度,以免日后反处下风。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参考文献

- [1]Bloom N, Griffith R, Van Reenen J. Do R&D tax credits work?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 1979–1997[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5(1): 1-31.
- [2]Choi S B, Park B I, Hong P. Does ownership structure matter for fi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Korean firms[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2, 20(3): 267-288.
- [3]Daily C M, Dalton D R.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under-managed versus professionally managed smal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2, 30(2): 25-34.
- [4]Eisenhardt K M.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1): 57-74.
- [5]Liang Q, Li X, Yang X, et al. How does family involvement affect innovation in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0(3): 677-695.
- [6]Nambisan S, Sawhney M. Orchestration processes in network-centr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field[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3): 40-57.
- [7]Terziovski M.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it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 resource - based view[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8): 892-902.
- [8]Zhou, W.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28(2).
- [9]陈晓红, 彭子晟, 韩文强.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沪深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8, 26(5): 1098-1104.

- [10]陈晓红,李喜华,曹裕.技术创新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0(4): 91-98.
- [11]杜占元,刘东.政府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J].中国软科学,1998 (9): 83-87.
- [12]郭研,刘一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关村的证据[J].经济科学,2011 (2): 117-128.
- [13]贺小刚,燕琼琼,梅琳等.创始人离任中的权力交接模式与企业成长——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 (10): 98-108.
- [14]贺小刚,张远飞,梅琳.创始人离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析[J].管理学报,2013,10(6): 816-823.
- [15]黄鲁成,黄斌.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管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
- [16]逯东,林高,杨丹.政府补助、研发支出与市场价值——来自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2,09:67-81.
- [17]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06:938-947.
- [18]欧新黔.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N][J].中小企业简报,2006 (81).
- [19]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政府干预与民营企业贷款[J].管理世界,2008 (8).
- [20]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管理世界,2009,03:134-142.
- [21]杨爱杰.美国和日本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及启示[J].科技与管理,2004, 6(5): 23-26.
- [22]姚世斌.基于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成长性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 (5): 12-15.
- [23]张毅华,王学栋.美国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及启示[J].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 16(6): 18-22.